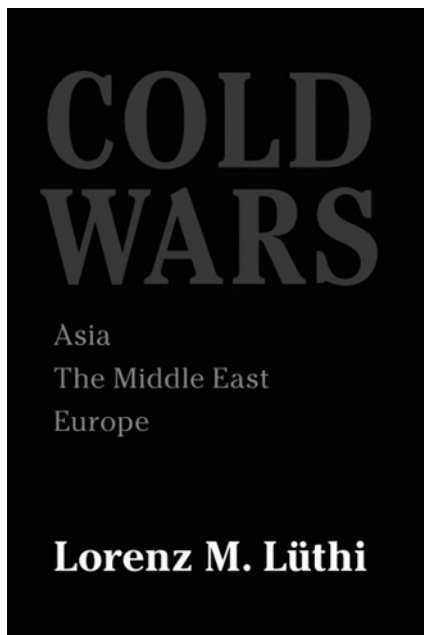


# 冷戰研究的區域視角

——評 Lorenz M. Lüthi, *Cold Wars: Asia, the Middle East, Europe*

● 夏亞峰



Lorenz M. Lüthi, *Cold Wars: Asia, the Middle Eas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 一 冷戰史研究 「去中心化」

儘管冷戰已經結束三十年，然而，英文世界的學者對於冷戰史研

究中一些最基本的問題至今還難以達成共識。例如，甚麼是冷戰？耶魯大學講座教授文安立 (Odd A. Westad) 認為冷戰是一種「國際體系」，與十六至十七世紀英國—西班牙的兩極對抗、十一世紀中國宋朝—遼國的兩極對抗有類似之處。這種國際體系的特點是兩極對抗、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積極動員同盟者參與各個領域的激烈鬥爭<sup>①</sup>。哈佛大學教授克萊默 (Mark Kramer) 認為，冷戰有三個根本特點：一是發生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80年代末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二是美蘇的對抗有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色彩，即自由民主與馬列主義的理論、制度之爭；三是世界分裂為由美蘇主導的兩大陣營<sup>②</sup>。這些都是對冷戰的傳統定義。

傳統冷戰史學關注的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以及它們所代表的兩大陣營之間的對抗；地區性衝突以及超級大國對其干涉，是作為華盛頓與莫斯科對抗所產生的後果來研究

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之外的學者提出冷戰史研究「去中心化」的議題和研究方法，力圖跳出冷戰史研究中以超級大國對抗為中心的主流敘述，將分析視角轉向地方性和區域性的冷戰經歷。

文安立一直重視冷戰時期超級大國對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這是他倡導的「去中心化」冷戰史新研究方法的重要內容，它也成為過去二十年冷戰史研究的一個熱點。

和書寫的，不是冷戰的主體。傳統冷戰史學很少討論反帝活動份子、共產主義活動家、歐洲小國的冷戰經歷。冷戰結束之後，美國之外的學者提出冷戰史研究「去中心化」的議題和研究方法，希望不要僅僅從超級大國的視角來觀察和研究冷戰史。他們力圖跳出冷戰史研究中以超級大國對抗為中心的主流敘述，將分析視角轉向地方性和區域性的冷戰經歷。2000年，文安立提出了冷戰史研究的三個新範式，實為三個最有潛力的研究方向：意識形態、科技、第三世界<sup>③</sup>。

二十多年來，文安立一直重視有關冷戰時期超級大國對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這是他倡導的「去中心化」冷戰史新研究方法的重要內容，它也成為過去二十年冷戰史研究的一個熱點。文安立在2005年出版《全球冷戰：第三世界的干涉與我們時代的形成》(*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一書，重點考察了冷戰對第三世界的深刻影響，揭示了冷戰向全球推進的過程。由於美蘇兩大軍事集團的存在和緊張對峙，冷戰中的歐洲局勢陷入僵局，取得突破的空間和機會很少。相反，美蘇在第三世界的角逐卻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機會，第三世界遂成為美蘇兩國推廣和驗證各自遵循的一套政治理論和經濟發展模式的場所。文安立認為，美蘇在第三世界的爭奪，實際上代表了冷戰最核心的問題，「冷戰最重要的方面既不是軍事的，也不是戰略的，也不是以歐洲為中心的，而是與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相關

聯的」<sup>④</sup>。文安立的研究表明，第三世界的領導人並不是美蘇爭奪中的傀儡和附庸，而是機會主義者，他們為了自身或國家的利益來行事。《全球冷戰》一書是「去中心化」研究方法的一個代表性成果，對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起到引領作用。

「去中心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取向就是將冷戰時期的中小國家放在顯著的位置，從發生在中小國家的事件中尋找與全球冷戰發展的關聯，而不只是關注這些事件與超級大國的關係。只有這樣才能將冷戰中的大國(如美國、蘇聯和英國)的故事講得恰如其分。惟欲達此目的，須將冷戰衝突的發展和冷戰之前的一系列問題(如非殖民化、民族國家的形成、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衝突的根源、歐洲一體化命題等)一起作綜合考察，從而修正「歐洲中心論」的冷戰史標準敘述範式。受文安立的影響和啟發，學者也嘗試從中東、拉丁美洲的角度，考察地方性、區域性的發展如何受到美蘇對抗的影響，以及這些地區是如何反過來對冷戰的發展與演變產生影響的<sup>⑤</sup>。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教授呂德量(Lorenz M. Lüthi)所著《冷戰：亞洲、中東和歐洲》(*Cold Wars: Asia, the Middle East, Europe*，引用只註頁碼)一書，是從亞洲、中東、歐洲多視角全面考察冷戰地區性發展的最新成果，是一部冷戰史研究「去中心化」的力作，對冷戰史研究作出重要貢獻。作者將冷戰史的敘述從全球視角轉向地區視角，較好地展現了中小國家在冷戰中的作用。他提出的最重要的觀點是：冷

戰時期亞洲、中東和歐洲的發展與演變並不源於美蘇兩國主導的冷戰；更為關鍵的是，這些地區性的變化與發展預示了冷戰的終結。他批評一些美國學者所堅持的「里根勝利學派」的觀點，認為美國總統里根 (Ronald W. Reagan) 對冷戰的和平終結所起的作用其實很有限，當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 (Mikhail S. Gorbachev) 並不想結束冷戰，只是蘇聯體制的弊端使其在 1980 年代後期無法再與美國抗衡下去。作者試圖更為準確地回答亞洲、中東、歐洲中小國家在冷戰結構性演變中所發揮的實際作用 (頁 7)，認為非殖民化、亞非國際主義、不結盟運動、泛阿拉伯主義、泛伊斯蘭主義、阿以衝突、歐洲經濟發展對美蘇主導的冷戰國際體制起到箝制作用 (頁 3-5)。

## 二 主要觀點

除了引言與結語之外，該著共有七個部分、二十四章，總計 770 多頁，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冷戰史專著，沒有一定冷戰史知識的讀者恐怕很難堅持讀完全書。

第一部分討論二戰結束後的國際體制，以及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的形成。英國試圖通過阿拉伯聯盟重振大英帝國的努力隨着 1956 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英國被迫撤軍而失敗，英國不再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國家之一。

第二部分討論的是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如何走出殖民時代，重點講述中國、越南和印度的冷戰歷史。作者認為中國、越南、印度對

亞洲冷戰的發展至關重要，這些國家充滿活力，有能力決定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和命運，而不為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所操縱和控制。

第三部分講述中東的冷戰歷史，主要討論阿以衝突。作者認為 1948 年阿以衝突、蘇伊士運河危機不是冷戰衝突，因為在阿以衝突中，美蘇都支持以色列；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美蘇都支持埃及。美蘇冷戰對抗在 1964 年才蔓延到中東，在之後的阿以衝突中，美國支持以色列，而蘇聯則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第四部分敘述了三種跨國政治組織和活動的冷戰歷史：亞非國際主義、不結盟運動、泛伊斯蘭主義。第五部分討論西歐和東歐的冷戰歷史，特別是 1940 到 70 年代西歐與東歐各自具有競爭力的經濟一體化過程，以及兩個超級大國對歐洲不同程度的影響。第六部分主要討論分裂的德國問題、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 (CSCE) 的成立，以及梵蒂岡、教皇保羅二世 (John Paul II) 對改善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特別是波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第七部分是對亞洲、中東、歐洲地區性冷戰終結的評估。

作者希望回答的中心問題是：冷戰時期亞洲、中東、歐洲地區和相關國家作為集體和個體，如何影響與改變全球冷戰體系？這種影響又如何為冷戰終結創造條件？在引言中，作者介紹了全書的組織結構和時間框架，將冷戰的起源與歐洲的帝國主義歷史連結起來，將冷戰的發展與二戰後非殖民化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繫在一起討論。從時間上來說，不同於傳統冷

呂德量提出的最重要的觀點是：冷戰時期亞洲、中東和歐洲的發展與演變並不源於美蘇兩國主導的冷戰；更為關鍵的是，這些地區性的變化與發展預示了冷戰的終結。

不同於傳統冷戰史學認為冷戰起源於1940年代中期，也不同於文安立將冷戰的起源追溯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激烈交鋒的十九世紀末，作者認為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是冷戰的源起。

戰史學認為冷戰起源於1940年代中期，也不同於文安立將冷戰的起源追溯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激烈交鋒的十九世紀末，作者認為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是冷戰的源起，蘇俄政權從一開始便致力於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來推翻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全世界建立沒有國家和階級的社會。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蘇俄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就着手建立世界共產黨的國際聯繫網絡，並用軍事手段建立和維繫社會主義陣營。早在1919年2月，斯大林就將世界描繪成以美、英、法、日為首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陣營與蘇俄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對抗。不久，蘇俄政府便建立了共產國際，目的是對抗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主導建立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幫助其他國家建立共產黨組織並指導他們為實現世界革命而鬥爭(頁3-4、17)。全書有以下四個相互關聯的分析和論述思路(頁1-2)：

第一，將冷戰敘述從全球性、影響全域的歷史事件，轉向更加重視地區性、局部性冷戰事件的研究。作者認為全球冷戰並不是所有地區衝突的根源：冷戰時期超級大國並不能完全操縱中小國家，中小國家常常利用大國之間的矛盾漁翁得利。重視冷戰時期地區性和民族國家層面的發展，可以更清楚地彰顯它們對國際體系結構性的影響。毫無疑問，如果沒有這些變化，冷戰不可能在1980年代末終結。

第二，認為重視冷戰時期地區性衝突的研究有利於將非殖民化與冷戰敘述更好地聯繫起來。作者認為越南、印度、巴基斯坦、伊拉

克、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等民族國家的形成始於冷戰之前，對這些國家引發的地區性衝突進行深入的歷史性研究，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主導1945年後全球冷戰的意識形態根源。不同於以往的研究認為冷戰源於歐洲，作者將亞洲(第二部分)、中東(第三部分)的章節排在歐洲(第五至六部分)之前，並認為在中國，冷戰對抗的起源可追溯到1927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

第三，認為地區性和民族國家層面的發展對兩個超級大國對抗的全球冷戰體系產生衝擊。1945年，世界由三個大國控制：美國、蘇聯和英國，儘管它們各自的力量並不相當。美國是資本主義陣營的領袖，蘇聯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而英國與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聯盟國家關係密切，這些國家主要位於北非、西非、東非和西亞。在二戰結束初期，英國試圖通過阿拉伯聯盟來重振搖搖欲墜的大英帝國。然而到了1960年代，英國走向衰落，美、蘇、英三國對各自集團的控制減弱，使得力量的天平向區域性和民族國家層面傾斜。美蘇兩個擁核大國競爭和地區性冷戰同時並存的國際體系逐漸形成。

第四，認為冷戰時期在亞洲、中東和歐洲發生的事件相互影響。在一個地區發生的事件會影響其他兩個地區，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影響是從亞洲到中東再到歐洲。例如，朝鮮戰爭發生在亞洲，順次影響到中國、越南、印度、阿拉伯聯盟國家和歐洲。這也是該著以地區來分章敘述(第二至七部分)的原因。

### 三 冷戰的結束時間

作者在書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新觀點。他指出冷戰不僅僅是美蘇之間的一種冷戰，而是有多個冷戰，主要發生在亞洲、中東和歐洲，這就是本書的標題「冷戰」(Cold Wars) 為複數的原因。美蘇兩國是冷戰時期的主角，但它們並不能主宰冷戰時期發生的大多數事情。冷戰影響但並不能決定冷戰時期在亞洲、中東和歐洲發生的很多事件，在世界其他地區發生的事情往往會反彈回來改變超級大國競爭的動力和冷戰的走向。他認為，冷戰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之前就已經結束。1970年代後期冷戰在中東已經結束，儘管蘇聯於1979年入侵阿富汗是一場冷戰衝突，然而，蘇聯出兵干涉的直接原因是為了防止泛伊斯蘭主義抬頭；到了1980年代初期，美蘇在中東應對的主要問題是伊斯蘭原教旨運動對國際安全的威脅，與冷戰已經沒有太大關係。由於中國脫離了蘇聯陣營，與美國結成「準同盟」(quasi-alliance) ⑥，

甚至與反共的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合作來阻止越南攫取地區霸權，越南也為此很快放棄推動世界革命的野心；始於二十世紀初、基於反帝共同理念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亞洲不復存在。因此，冷戰到1980年代初期在亞洲已經結束。在歐洲，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困境、蘇聯衛星國逐漸融入國際經濟體制以及西歐國家不斷增長的財富，表明冷戰在柏林牆倒塌之前就已經結束(頁612-13)。

冷戰究竟於何時結束？這是西方學術界的一個爭論熱點問題。一般認為，1991年12月蘇聯解體標誌着冷戰徹底終結。然而，學者對此問題有很大的分歧。冷戰意味着十七世紀確定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Westphalian System)的崩潰。著名國際史學者崔登堡(Marc Trachtenberg)在1999年出版的《搭建和平：歐洲和解的形成，1945-1963》(*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一書中認為，美蘇兩個相互對立的國家，不承認對方領土

作者指出，冷戰不僅僅是美蘇之間的一種冷戰，而是有多個冷戰，主要發生在亞洲、中東和歐洲。冷戰影響但並不能決定冷戰時期在亞洲、中東和歐洲發生的很多事件。



美國總統里根(Ronald W. Reagan)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資料圖片)

作者將冷戰在亞洲、中東和歐洲的結束分開論述，並以美蘇在地區性和民族國家層面事務上失去互相對抗的意願，作為冷戰結束的標誌，為目前相關討論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視角。

主權、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合法性。他認為冷戰在1963年就已結束，因為美、蘇、英三國在這一年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Limited Test Ban Treaty*)，確保冷戰對抗的雙方從此可以和平相處，實現自冷戰開始以來美蘇雙方希望「搭建的和平」(constructed peace)<sup>⑦</sup>。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斯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在2012年發表文章〈冷戰的零度〉(“Cold War Degree Zero”)，贊同崔登堡的觀點，認為冷戰史研究應該回歸它的根源，就是二戰後美國為建立國際秩序的一個國家項目，應該主要研究政府的政策制訂與實施過程，時間限定在1945至1963年之間<sup>⑧</sup>。克萊默認為冷戰在1989年底結束。他提出的理由是：到1989年，蘇聯已經明確不會用武力來維持東歐共產黨政權，這些政權的垮台表明歐洲不再是一個分離的歐洲，也就是說冷戰得以持續的根本原因已經不復存在；在1989至1991年間，美蘇在國際問題方面緊密合作，是冷戰時期根本不可能的事情<sup>⑨</sup>。

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祖博克(Vladislav Zubok)指出，在1989年12月美蘇首腦馬耳他峰會上，美國總統布什(George H. W. Bush)與戈爾巴喬夫共同宣布冷戰終結。自此之後，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堅信冷戰已經結束，他們急不可待地、不顧一切代價地希望與美國、北約(NATO)以及西歐合作並建立夥伴關係。然而，從美國政府的角度來看，冷戰並沒有結束。他們要利用柏林牆的倒塌來兼併東德乃至整個東歐。布什政府

的高層在內部會議上繼續用冷戰思維討論美蘇關係和對蘇政策。直到蘇聯解體之後的1992年1月29日，布什發表國情諮文演說，聲稱「承蒙天恩，美國贏得了冷戰勝利！」在美國人看來，美蘇冷戰對抗由於蘇聯的解體才算真正結束<sup>⑩</sup>。對此，文安立在《冷戰：一部世界史》(*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這樣寫道，1991年底「蘇聯解體清除了冷戰在國際體系中最後的殘留部分」<sup>⑪</sup>。筆者認為，冷戰和平終結是一個歷史過程，可以從1988年底里根宣布冷戰結束算起，到1991年7月華沙條約組織(Warsaw Pact)解散，作為冷戰對抗的一個軍事集團消失，冷戰正式結束<sup>⑫</sup>。作者將冷戰在亞洲、中東和歐洲的結束分開論述，並以美蘇在地區性和民族國家層面事務上失去互相對抗的意願，作為冷戰結束的標誌，則為目前相關討論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視角。

#### 四 本書優點和缺點

作者是西方少數幾位能熟練使用中文文獻的冷戰史學者，書中有關中國冷戰歷史的敘述很有見地。作者認為冷戰時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中等力量的國家(頁1)，它在1950年與蘇聯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加盟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對印度支那、印度甚至中東、歐洲的發展都有較大影響。然而，中國自1960年代初期與蘇聯交惡，到60年代中期實際已退出社會主義陣營；隨後在70年代初期與美國緩和關係，這

一系列外交舉措對北越的抗美戰爭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同時也迫使蘇聯強化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控制，使這些國家無法走上改革的道路（頁611）。作者敏銳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理解中國從一個受西方列強凌辱的弱國轉變為一個新型的外交和軍事大國的關鍵，中國成功發展核武器項目使得它在70年代就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舉足輕重（頁133）。作者還指出70年代中國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實現中美關係緩和，與美國結成「準同盟」，但中國並非沒有其他選擇。1972年2月訪華之後僅僅三個月，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又跑到莫斯科與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會晤，美蘇關係大為改善。在毛澤東看來，尼克松利用了中國，從而使得美國在與蘇聯的談判中取得主動，而中美關係緩和並沒有實現毛所希望的「聯美抗蘇」局面。到了1973年，中美關係已經進入死胡同。1974年，毛提出中國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這一思想的要點是：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非拉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包括日本、加拿大、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是第二世界。毛強調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實際上是指中國要聯合發展中國家，共同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頁135-37）。在毛去世後的1978年，鄧小平成為中國最高決策者，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於1979年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三個世界」理論也逐漸從中國的輿論宣傳中消失。儘管冷戰時期的中

國是個中等力量的國家，但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已經是個全球性的大國。在冷戰史研究領域，需要更好地利用中文資料，加強對中國國家建設歷史、中國對經濟發展和國際關係觀點的研究，就此而言，本書起到表率作用。

該著涉及的研究領域寬廣、資料翔實、細節令人信服。作者查閱了四大洲二十多家檔案館的資料，引用資料的註解部分佔120多頁。有關1960年代法國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政府時期災難性的外交政策、1980年代歐洲及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崛起，特別是有關中東冷戰的論述，很有新意。筆者認為，該著將成為所有研究冷戰史學者的標準資料手冊。無論是專業研究人員還是冷戰史的愛好者，都能從本書中發現他們所需要的信息。

當然，這樣一本大部頭的學術著作，也難免有掛一漏萬、美中不足之憾。例如，從地區來看，該著對冷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發展與演變、對古巴在冷戰中的國際活動，敘述比較單薄。從觀點上看，作者認為冷戰並非注定要發生的，而是「意識形態衝突、單方面的決定、政治分歧、誤解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頁13）。在作者看來，冷戰源於蘇聯試圖推翻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全球建立一個沒有國家和階級的社會（頁17-18）。然而，他既沒有討論十九世紀後期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經濟弊端，也沒有討論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階段性動盪。作者對二十世紀上半葉西方資

作者認為冷戰並非注定要發生的，冷戰源於蘇聯試圖推翻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全球建立一個沒有國家和階級的社會。然而，他既沒有討論十九世紀後期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的經濟弊端，也沒有討論二十世紀初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階段性動盪。

呂德量這部著作給我們展示了冷戰的多樣性，將觀察冷戰的視角聚焦在亞洲、中東和歐洲而不是美蘇兩國，使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冷戰衝突不僅僅是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

本主義和社會左派力量的崛起、西方社會渴望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結構性變革等重要背景也沒有做適當的交代。他所關心和討論的問題是帝國的野心和意識形態的衝突，完全忽視了大國對地緣政治的考量（如美國堅持對戰敗的德國分區佔領，以及對日本單獨佔領並和平改造，以便將它們納入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全球資本主義潛在動力與二戰歷史遺產對決策者的影響（如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二戰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動盪和政治騷動使得美蘇兩國領導人面臨危機，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人認識到將全球資本主義核心工業區與中東、東南亞以及非洲的市場和原材料產地結合在一起的重要性）<sup>⑬</sup>。

此外，本書的寫作模式還是傳統外交史的套路，主要講述男性領導人的故事。除論及印度總理甘地夫人 (Indira Gandhi)、以色列總理梅厄 (Golda Meir) 的事例之外，全書再也沒有女性的聲音。至於邊緣人物、小人物的聲音，則絲毫未曾關照。對非國家行為體 (non-state actor)，例如猶太復國主義者、巴勒斯坦激進份子、自由鬥士、學生運動活動份子等，書中雖有所涉及，但他們大多是作為敘述重大事件的背景出現，而不是作為主角登場。令人遺憾的是，作者沒有討論日本對亞洲冷戰發展的作用。事實上，美國對和平改造和重建戰敗的日本十分重視。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恢復和重建日本，可保證日本留在資本主義陣營，防止共產主義滲透到東南亞，保證東南亞條約組織 (SEATO) 的建立<sup>⑭</sup>。

## 五 小結

2017年，時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的文安立出版《冷戰：一部世界史》。這是一部以全球為視角、有關冷戰史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包括了東西方冷戰史，也涉及南北方的冷戰故事，目的是講述冷戰在各大洲的歷史，展示不同人群所經歷的不同的冷戰衝突<sup>⑮</sup>。呂德量這部著作給我們展示了冷戰的多樣性，將觀察冷戰的視角聚焦在亞洲、中東和歐洲而不是美蘇兩國，使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冷戰衝突不僅僅是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該著是對以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中心和歐洲中心主義冷戰史學的修正。通過這部著作，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亞非國際主義、不結盟運動、泛伊斯蘭主義等對冷戰進程與演變的影響。筆者相信，呂德量的《冷戰：亞洲、中東和歐洲》將與文安立的《冷戰：一部世界史》一樣受到學界的關注及讀者的青睞。

### 註釋

①① Odd A. Westad, *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7), 1-2; 616.

② Mark Kramer, "Recen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Topics,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19 November 2020, Tencent Platform Lecture.

③ Odd A. Westad, "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Three (Possible) Paradigms", *Diplomatic History* 24, no. 4 (2000): 551-65.

④ 參見 Odd A.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相關詳細討論，參見夏亞峰：〈十八世紀以來的中國與世界——評Odd A. Westad,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4年6月號，頁115-26。

⑤ 參見Nathan J. Citino,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Cold War”, *Cold War History* 19, no. 3 (2019): 441-56; Thomas C. Field, Jr., Stella Krepp, and Vanni Pettinà, eds., *Latin America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20)。

⑥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1), 247.

⑦ 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398-402.

⑧ Anders Stephanson, “Cold War Degree Zero”, in *Uncertain Empire: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Idea of the Cold War*, ed. Joel Isaac and Duncan B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9-49.

⑨ 克萊默(Mark Kramer)教授給筆者來函，2021年11月28日。

⑩ 祖博克(Vladislav Zubok)教授回答筆者問題的記錄，參見“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13 December 2021,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ww.youtube.com/watch?v=90n1NDgc4fY](http://www.youtube.com/watch?v=90n1NDgc4fY)。

⑪ 筆者曾就冷戰何時結束的問題聽取著名冷戰史專家沈志華教授的看法。他認為，作為國家戰略和政策，1989年初蘇聯已經全面放棄冷戰，到1991年7月華沙條約組織解散之時，美蘇冷

戰對抗的兩極格局已不復存在。所以，即使蘇聯沒有在1991年12月解體，冷戰也已經結束。不過，作為冷戰對抗主體的蘇聯在華沙條約組織解體後不到半年便不復存在了，人們更有理由認為這代表着冷戰結束。因為時間靠得很近，把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這兩個歷史事件視為同時發生，從歷史的長河中看，也未嘗不可。參見沈志華給筆者微信來函，2021年11月27日。

⑫ Melvyn P. Leffler, “Book Review: Lorenz M. Lüthi, *Cold Wars: Asia, the Middle East, Europ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3, no. 2 (2021): 162-64; George C. Herring, *The American Century and Beyond: U.S. Foreign Relations, 1893-201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324-25, 333-35.

⑬ 相關研究參見Howard B. Schonberger, *Aftermath of War: Americans and the Remaking of Japan, 1945-1952* (Kent, OH: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William S. Borden, *The Pacific Allianc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and Japanese Trade Recovery, 1947-1955*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⑭ 參見Odd A. Westad, *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有關這本書的詳細介紹，參見夏亞峰：〈冷戰與當今世界——評Odd A. Westad, *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二十一世紀》，2018年12月號，頁135-44。

夏亞峰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研究  
員，美國長島大學資深教授。